

論儒林外史的人物諷刺

王璣

諷刺文學是不能游離在政治的邊緣，和現實社會脫節的；沒有強烈政治性的諷刺文學，無異是海市蜃樓的幻景。牠必須透過幾個塑造的典型，將不良的社會制度，藉人物的活動，予以中正的批判。儒林外史，雖然諷刺的是智識階級的迂儒腐士假名士……實際是在抨擊當時社會制度的不良。牠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政治的，而不是藝術的。

儒林外史的作者，為什麼不汲取其他階層的人物，特意挑選當時的智識階級，作為他批判社會制度的引線呢？因為吳敬梓先生，生於清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卒於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歷康雍乾三朝。在這五十四年間，滿清帝國主義為着鞏固他的政權，對消弭士大夫階級的反抗措施，越來越毒辣：一面加強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濫施刑戮，任意株連，以鎮壓士大夫階級領導的民族革命運動；一面施行牢籠政策，利用科名，和宋儒重視的倫理觀念，作懷柔的工具，轉移士大夫們的思想，使他們消磨精力於八股試帖，和世事無關的學術研究。冀圖從心理上，根本消弭民族革命運動。作者目擊當時的吏治腐敗，統制階級的草菅人命，任意屠殺，劫掠；和智識階級的為其牢籠，熱心功名，將精力全消耗在八股試帖，忘卻亡國的慘痛。悲憤之餘，禁不住猛力攻擊知識階級的麻木，放棄了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地位，甘心專敵。從乾隆五年（一七四〇）至十五年（一七五〇）以十年的功夫，完成了這諷刺文學的鉅著。（註一）

諷刺文學，假若只盡於割除社會的膿包，而沒有將作者正確的世

界觀，經過創作的過程，予以合理的安排；不管他辭藻怎樣華麗，技巧怎樣純熟，還只是藝術上的成就，而沒有政治上的功效。吳敬梓不但遠景的渲染，以智識階級的不合作運動，逐跡山林，鄙視功名富貴，作他怎樣改革社會制度的銳擗。不過因為當時統治階級的屢興文字獄，莊廷鑑，戴名世，汪景祺，查嗣庭，呂留良，胡中藻等人的血跡未乾，作者不敢直接批評時政，排斥滿清，只借荆元，蓋寬，季遐年，王太等人的遯跡山林，作他對異族不合作運動的倡議。例如第五十五回荆元所說的「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饱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這裏所說的不貪圖人的富貴，不伺候人的顏色，當然指的是不貪圖異族的殘羹冷食，不做壓榨聚斂人民的異族的幫兇。

吳敬梓因為他的曾祖吳國對，是一位八股大家，他家數代都由此出身；自己也在八股上用過工夫，所以對於八股社會中的形形色色，特別清楚。儒林外史裏的人物，都是他所耳聞目見的，這些人物，他既恨之切，也愛之深。雖然書中對於這些人，刻毒的諷刺，盡情的嘲諷；實際作者下筆前，是抑制不住他的悲憤和憐愛的。從范進周進等人的遭遇裏，我們看到的不是他們未第前的貧困，而是智識階級為牢籠政策所羈縻的慘痛。作者描寫他們的醜態，用意不是想博得讀者盡情的笑樂，而是希望大家知道民族意識被剷除淨盡的哀痛。

124926 儒林外史裏被諷刺的，雖然是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迂儒腐士，假名士，假道學的人……實際却是不良的社會制度，和異族的高

歷政策，牢籠懷柔的措施。換句話說，作者是借這些被諷刺的人物，對滿清的統治，提出嚴重的抗議。像書中寫杜少卿因裝病得辭薦辟時，曾說：「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三十四回）就是反對那時滿

清政府詔令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辭」的牢籠政策。書中的杜少卿，就是作者自己的寫照。作者借他揭出異族統治階級的懷柔陰謀，不願畏威懷德，做他們的順民，和欺壓自己同胞的幫兇。他要做自己的事：去喚醒士大夫們，不為異族的懷柔政策所欺騙。但是儒林外史，自成書直到現在，作者苦心孤詣的寓意，很少被人了解；大家只知道他反對科舉制度，諷刺熱心功名的士子，却忽略了作者的民族主義思想。我們在研究儒林外史的時候，一定要先了解牠的時代關係，和社會背景；否則作者的原意，就會被輕易的忽略了。

儒林外史裏所諷刺的人物，和作者所處身的時代，是有着不可分割的連繫，雖然作者在書裏一再說明，他所敘述的是明朝的事；實際却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間作者所經歷的事。撇開作者所處身的時代，要想真正了解儒林外史裏所諷刺的人物，無異緣木求魚！所以儒林外史，不是明朝儒林間的趣聞佚事，而是清初社會的寫真。從書中所諷刺的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康熙乾三朝間的政治組織，鎮壓漢人的慘酷措施，和利用科名懷柔牢籠的政策，在士林間，已經收到了若何的效果。儒林外史裏所諷刺的人，全是無靈性的行尸走肉，作者不僅嘲笑他們的愚昧，淺陋，無知，還悲痛於他們民族意識的喪失，和滿清帝國主義的毒辣，鉗制言論，統治言論的成功。

僅僅把儒林外史視為反對科舉制度的作品，那是太膚淺的見解。作者不僅反對科舉制度，還在反對滿清異族的統治；不過他的這種企圖，在當時的高歷政策下，無法使其明朗化，只能藉嘲諷科舉制度的掩飾，給這思想偽裝在趣聞佚事裏。儒林外史裏所諷刺的人物，表

面看起來，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迂儒腐士，假名士，假道學的士子，實際却是企圖永久把漢人視為他腳下的泥沙，可以任意踐踏的滿清帝國主義。作者藉這些被愚弄，被欺瞞的儒林士子，將滿清帝國主義的暴政，和其漸趨衰落，勾畫出一幅顯明的輪廓。

二

清兵入關後，諸王及八旗兵將，強圈百姓田地，弄得餓莩載道。康熙時，為着鞏固他的統治，消弭人民的仇滿思想，覺得這樣會激起民變，乃下令禁止。但是，在勵精圖治，整飭吏治的煙幕下，官吏的玩法營私，却更加變本加厲。明珠、佛倫、索額圖、庫禮等，依然各樹朋黨，擅權納賄；不過他們稍為歛跡，利用漢奸們做他們敲索的橋梁，不敢明目張膽的直接壓榨人民罷了。他們利用漢臣徐乾學、高士奇、王鴻緒……這些走狗們，與其隱相結合，做他們罪行的護身符。一些漢臣，欲求固位，不得不剝削百姓來伺奉異族的主子。及至激起民變，又被視做犧牲，說他們貪污枉法，予以明正典刑，來哄騙百姓。所以被人盛稱的康熙乾三朝吏治的繁絕風清，只是御用文人，秉持他異族主子的意旨，在粉飾太平。

吳敬梓特別痛恨這些被御用的貪官污吏，和在貪官污吏卵翼下的土豪劣紳。在儒林外史裏，一開始就盡情的嘲罵他們無知和無恥；清史中我們無法看到的盛世的黑暗面，在儒林外史裏，却被完全揭露了出來。很多人指摘儒林外史裏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描寫，過於誇張，實在是給塗改了史實的御用史篇所蒙蔽了。

儒林外史裏所嘲諷的貪官污吏，都用的側筆。雖沒有費很多的篇幅，像官場現形記那樣顯明的直接攻擊吏治，却用土豪劣紳的和官府勾結，魚肉鄉民，草菅人命，將貪官污吏的罪行，烘托出來。既不必費很多的筆墨，又可以使讀者特別容易為書中的氛圍所感染。像第四回作者所諷刺的湯知縣，根本就沒有直接說他怎樣貪污，只借嚴貢生的嘴，說出他的貪贓枉法：「『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

中，錢糧耗羨、花布、牛、驢、漁船、田房稅、不下萬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畫着，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個做法，不過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枝葉，還用着我們幾個要緊的人。」

吳敬梓不但盡情的指摘貪官污吏的賄賂公行，尤其痛恨他們的草菅人命，以及不惜用種種卑鄙的手段，鎮壓民衆的反抗運動。像第四回的湯知縣，爲着圖陞遷，沽名釣譽的不受回子師父極少的（五十斤牛肉）的賄禮；將他重重的打了三十幾板，用了一面大枷，把肉推在枷上，將他活活的枷死，以激起民變。湯知縣一見事態擴大，一面用哄騙的手段，說了許多好話，將囉嗦的回子勸散了，一面將爲首的回子問成奸民挾制官府的罪，使百姓們懼威懷德的不敢再有什麼舉動。就是對卑鄙已極的官吏，痛加抨擊。換句話說，就是作者一面諷刺統治階級在羣衆力量下的惶恐，顫慄；一面揭露出他們用種種欺騙的手段，鎮壓民衆反抗運動的無恥。下面所寫的這一段，差不多就個個字都有刺。

「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寫了個稟帖，稟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書檄了知縣去。湯奉見了按察司，摘去紗帽，只管磕頭。按察司道：『論起來，這件事你湯老爺也忒猛浪了些。不過枷責就罷了，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這個成何刑法？但此刁風也不可長，我這裏少不得拿幾個爲頭的盡法處置。你且回衙門去辦事，凡事須要斟酌些，不可任性。』」（第五回）

因爲牢籠政策，在當時的士大夫階級，起了昇華作用；爲着在異族的主子手裏討一口殘羹冷食，他們甘心被御用爲虐殺自己同胞的工具，將巧取豪奪來的，除了供自己過着糜爛的生活，都拿去奉獻給自己的上司，因此他們貪得無厭的盡量剝削人民。吳敬梓既痛心因所謂能員幹吏的暴斂，弄得民生凋敝；又傷心士大夫階級的徵逐酒食，忘天日的生活。所以他在第八回裏，用先後兩任的南昌太守，盡情譏諷

當時士大夫階級的昏庸與無恥。用前任太守違佑清高賢明，布衣蔬食，因爲不願爲異族的主子，來巧取豪奪，訟簡刑清，居然被上司目爲年老多病，不能精於政事，繼任的王惠，既善於逢迎，又善於聚斂，却被上司認爲是江西第一個能員，將當時的吏治不能清明，完全是統治階級暗中獎勵的陰謀，暴露無遺。作者在敍述王惠的政績時，嘲笑得極爲刻毒，令人啼笑不得。

「蘧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王太守並不知這話是譏諷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要替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真。』……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果然聽了蘧公子的話，釘了一把頭號的庫戥，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頭號板子。把兩根板子拿到內衙上秤，較了一輕一重，都寫了暗號在上面：出來坐堂之時，吩咐叫用大板，皂隸若取那輕的，就知他得了錢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這些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厲害，睡夢裏也是怕的。因此上司訪聞，都道是江西第一個能員。」

貪官污吏爲着恣意漁肉百姓，不惜豢養大批的土豪劣紳。利用他們的稔知民情，不但可以橫征暴斂，沽勢恣睢；還可以大施欺詐，使百姓們俯首帖耳的任其宰割。假若說貪官污吏是吸血的蚊羣，那末，土豪劣紳就是老子的溫床，污泥臭垢。這些貪官污吏的策士，以自己的雙重地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常常忽兒假借官府的權勢，恐嚇百姓，使其就範；忽兒哄騙百姓，作他們要挾官府的工具；或假意同情，破壞羣衆的組織，便於貪官污吏將其一網打盡。吳敬梓覺得土豪劣紳比貪官污吏還要可怕，所以在全書中，對土豪劣紳的諷刺，不惜以很多寶貴的篇幅，來刻畫他們的醜惡。

儒林外史裏的幾個土豪劣紳，嚴大位、張靜齋、權勿用、潘自業……等人，身分和個性，看去雖都十分相同，但作者寫來，却毫不含

124928 混：嚴大位有嚴大位的個性，張靜齋有張靜齋的個性，權勿用只是僨丁；權勿用的混食豪門；張靜齋的結交官府，漁肉鄉民；潘自業的借

藩司衙門，隱佔身體，把持官府，包攬詞訟；作者寫來，都各極其妙，淋漓盡致，栩栩若生。尤以諷刺嚴貢生（大位）的裝病訛詐船丁的描寫，將士豪劣紳的漁肉鄉民，骨露的刻畫出來。在第六回裏，作者雖然用了很多的篇幅，描繪嚴大位的奸詐，但是却沒有一個字是多餘的，一句話是累贅的。

「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着吃了幾片，將肚子揉着，放了兩個大屁，登時好了。剩下幾片雲片糕，擱在後鵝口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駕長失錢，左手把着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嚴貢生只作不看見。少刻，船攏了碼頭。嚴貢生叫來富着速叫他兩乘轎子來，擺齊執事，將二相公同新娘先送到家裏去。又叫些碼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嚴貢生轉身走進船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問四斗子道：『我的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藥？』嚴貢生道：『方才我吃的是藥？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才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膽就吃了。』嚴貢生道：『吃了好賤的雲片糕！你曉得我這裏頭是些什麼東西？』掌舵的道：『雲片糕不過是些瓜仁、核桃、洋糖、麵粉做成的了，有什麼東西？』嚴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個暈病，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你這奴才豬八戒吃人參果，全不知滋味！說的好容易！是雲片糕！方才這幾片，不要說，值幾十兩的銀子！半夜裏不見了鋪頭子，攢到賊肚裏！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病，却拿什麼藥來醫？你這奴才，害我不淺！』——叫四斗子開匣，寫帖子——『送還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掌舵的嚇

了，陪着笑臉道：『小的剛吃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藥，只說是雲片糕。』嚴貢生道：『還說是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個嘴巴！』說着，已把帖子寫了，遞給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幫船家搬着。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齊道：『嚴老爺，而今是他不是，不該吃了嚴老爺的藥，但他是個窮人，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若是送到縣裏，他那裏耽得住？如今只求嚴老爺開恩，高抬貴手，恕過他罷。』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腳夫走過幾個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上不是，方才若不是着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才查到這個藥。如今自知理虧，還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磕頭討饒？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們不成？』衆人一齊捺着掌舵的磕了幾個頭。嚴貢生轉灣道：『既然你衆人說，我又喜事忽忽，且放着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賬！不怕他飛上天去！』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廝跟着，一頭去了。船家眼睜睜看着他走去了。』

翦伯贊先生在批評杜詩的時候，會說：『我再讀杜詩，才知道他並不是爲作詩而作詩，而是爲了不得不作詩而作詩。』（杜甫研究）吳敬梓寫儒林外史，也是爲了不得不寫，才來寫的。因爲吳敬梓生當清代盛世，明亡後，已因清代的牢籠政策和高壓措施，將士大夫階級的民族思想消滅淨盡。深深的痛恨知識階級醉生夢死，和喪心病狂的甘心爲虎作倀，使人民更加貧苦。作者一再諷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是代言人民的痛苦，將那些被誑騙，訛詐，漁肉的鄉民的痛苦，盡情的發洩出來。因爲他自中年後，飽受餓寒，極爲酸辛，殘酷的現實，使他益發了解窮人的痛苦，同情人民遭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悲痛。所以作者特別注意於平民生活的勾畫，用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作背景，將被污辱與損害的日常生活，塗抹到畫幅上。他在諷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時候，同時就在敘述平民們在過着怎樣悲慘的生活。例如書中諷刺張靜齋的時候，就替人民和僧尼哀訴；敘述權勿用

的混食豪門時，早就替奸拐的尼姑，預先留下申訴的伏筆。同時在譏諷潘自業的時候，一再拿被高利貸剝削的良民做陪襯，證實他的橫行鄉里；在嘲罵嚴大位的時候，不僅諷刺他奸刁，無賴，還替船丁們的被愚弄，連聲叫屈。……

三

滿清統治階級的高壓政策，與牢籠政策使當時的智識階級噤若寒蟬。不肯消沉的，雖然在下層社會，利用哥老會的組織，隱植民族思想的暗流，預備東山再起；但這股地層的暗流，並不能匯為快堤的春水，根本不能動搖統治階級的政權，而一些不肖的文人，却都已碌碌於科名，把民族間的仇恨，丟到九霄雲外了。同時因為滿清的統治階級大規模搜求遺書，任意銷毀竄改，利用理學，假稱古右文的美名，銷磨學者的精力，和杜塞反動思想的來源，使當時的士大夫階級不消磨精力於八股試帖，也只得埋首於世事無關的學術研究，弄得持

節重志的風氣，漸趨式微，遁勁不拔的士人消聲匿跡；甘心願為貳臣

的漸漸為利祿所驅使，變為迂腐，形同行尸走肉，真正令人痛心！

吳敬梓痛恨貪官污吏的聚斂，土豪劣紳的為虎作倀，故對其毫無同情，盡力貶抑；但以士大夫們漸漸變為迂腐，是統治階級的箝制言論，牢籠政策的成功，是貶斥之外，禁不住熱情的衝動，特別寄予無限的憐愛。作者有感於民族意識的根絕，要想以少數人從事民族革命運動的工作，是無異希望死灰復燃，決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因為有形的刑罰，並不能箝制言論；無形的牢籠，實足以將野火未能燒盡的春草，從層土中掘去了根泥。可怕的並不是屠殺，而是科舉制度，和博學鴻詞的榮辟，銷毀竄改民族思想的書籍。（註二）所以他痛恨八股極深，對八股社會，也諷刺得極厲害。且特別褒揚漠視功名富貴的人，對他們的高風亮節，極為嘉許。

作者狠狠地攻擊那些醉心舉業，除了制藝，百不經意，毫無常識，自以為聖賢豪傑的智識階級；並且將統治階級掛着孔孟招牌的本

心，並不叫人遵照孔孟的遺教，而是要他們在八股文，試帖詩中消磨志氣的陰謀，巧妙地揭露出來。他在十三回中，借馬二先生對滿清的懷柔政策，利用科名的惡毒牢籠，拼命的攻擊。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又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孟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從上面的一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智識階級，醉心功名利祿的無恥，有意規避民族存亡的問題。不考慮這種被御用為消滅國人民族意識的事，是否能做，是否危險，是否是一種過失；也不考慮做了這種危害全民族的事，是否有悔恨的一天。假若要真的遵照孔子的『言寡尤，行寡悔』的遺教，他們實在有重行考慮的必要。但是他真的要做到說話少過失，行事少懊悔，統治階級不但不肯給他官做，激發的人性，也會使他們不獲去做官。馬二先生是被作者看做迂儒腐士來嘲笑的，是被視為功民利祿所奴使的士人。但是，作者筆下的馬二先生，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愚昧，為功名利祿所牢籠；而是統治階級的牢籠政策，惡毒的殺害了士大夫們的民族思想。

鄭振鐸譚正璧兩位先生，對吳敬梓的嘲諷迂儒腐士，誤解為處處在維持他的正統的儒家思想，見解仍帶酸氣；（註三）也許是因為書中貶斥統治階級假孔孟之道，行牢籠政策，褒揚『言寡尤，行寡悔』的政治哲學，認為見解過於酸腐。其實作者的原意，只在揭露滿清帝國

124930 主義的假孔孟爲招牌，實行他的牢籠政策的陰謀。馬二先生的迂腐見解，並不就是作者的政治哲學，馬二先生並不是作者的自畫像；真正是作者自身的寫照的，乃是書中的杜少卿。杜無心仕途，嫉恨功名，反對專心藝術，不學無術的人。這種見解，實在不能說他迂闊，因爲作者是最反對爲科舉所羈縻得迂闊的人，在儒林外史裏，對於迂儒腐士的諷刺，不是可以隨撫即得嗎！

書中迂儒腐士寫得最成功的，有馬靜（馬二先生），周進，范進……這幾個人，都是牢籠政策下的犧牲者，可憐蟲。馬靜勸蘧公孫要以文章舉業爲主，沒有第二件可以出人頭地；周進因爲熱心功名，看貢院時痛恨自己六十多歲，仍未會進學，竟哭的死去活來；范進因爲聽得高中舉人，一時喜歡的瘋了。作者將這些甘心爲異族奴使的士人，盡情的嘲笑，尤其將這些只知制藝，毫無常識，極爲淺陋，不知亡國之痛的麻木的人的酸腐，描寫得極爲深刻。例如第四回，寫范進丁母憂後，同張靜齋去謁湯知縣的那一段，就將酸腐的士人，嘲罵得淋漓盡致。

「……兩人進來，先是靜齋謁過，范進上來敍師生之禮。馮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吃茶，同靜齋敍了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才說道：『先母見背，還制丁憂。』馮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破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卽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是不用葷酒，却是不會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在嘴裏，方才放心。……」

爲滿清帝國主義牢籠政策所羈縻的迂儒腐士，他們不但迂闊得爲非取得功名不可；酸腐得不盡人情，甚至沽名釣譽的做作；其淺陋

無知，只知制藝，毫無常識，尤其令人痛心。書中對於這些迂儒腐士的淺陋，毫不誇張，毫不渲染，寫來已使人啼笑不得，維妙維肖。例如張靜齋范進等人都市舉人，湯知縣還是個進士，都是八股時文中出身的，竟淺陋得連開國名臣劉基的歷史，都不清楚，還不令人啼笑皆非嗎？

「張靜齋道：『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罐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皇上憐了，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死了。』湯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

這種嘲諷，正如胡適先生在五十年來中國文學一文裏所說的：『有心人的嘲諷，不是笑罵，乃是痛哭；不是輕薄，乃是恨極無可如何，不得已而爲之』的。吳敬梓恨極了滿清帝國主義所用的牢籠政策，使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迷失了本性，個個變爲行尸走肉，所以在全書中，對迂儒腐士的諷刺，並不像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那樣的刻毒，而是含着無數的酸辛，在放聲大哭。爲喪失了的民族意識而痛哭，爲士大夫們的麻木不仁而痛哭。

因爲明末遺民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顥等，不受徵辟，一時蔚爲風氣；很多有節操的文人，都不肯和滿清帝國主義合作，甘心做他的子民。雖然惱於統治階級的淫威，只能探究典章制度，以備後繼的應用；空有恢復明室的鴻志，不能有所作爲。但是未嘗不可以振奋人心，使統治階級大受刺激。所以統治階級們，在驚惶之餘，特別努力的施行牢籠政策，希圖根本消磨智識階級的志氣，杜絕人民仇滿的思想。這種政策積極施行的結果，很多人禁不住威逼利誘，都甘心去謀取功名。雖然那些別有抱負的人，仍在提倡不合作主義，力爲中流砥柱；但是動搖份子，漸漸背叛了自己的陣營，假冒名士的頭銜，

做着叛逆的勾當。甚至甘心爲統治階級的特務，來網盡自己的同志，希圖邀功爭寵，假托無意功名富貴，以高風亮節來炫耀；其實心齷功名富貴，不惜媚人下人，作種種無恥的勾當。後來有些奸詐之徒，不學無術，也來假冒名士的堅貞，以售其尸位權門，或謀求衣食的毒計。這種人，本是市井無賴，匿身儒林，尤其可恨。所以吳敬梓也極力攻擊他們，嘲諷其卑鄙醜陋，揭發其行爲的無恥。惺園退士特別稱譽作者在這方面的成就，認爲「其寫小人也，窺其肺腑，描其聲態，畫圖所不能到者，筆乃足以達之。評語尤爲曲盡情僞，一歸於正。」

書中的假名士很多：丁詩、牛浦、王義安、胡績、張俊名、景本薰、楊允、諸葛佑、權勿用……等人，或爲市井無賴，假冒風雅；或爲盜竊名士之名，售其混食權門之計；或爲婊子家的烏龜，冒充斯文；或爲生性鄙吝，極爲貪財，要學燒銀法，能做幾首歪詩的自稱名士……都是些動搖的智識階級，或破落戶。他們也許知道應該要推翻滿清帝國主義的統治，才能安享太平，却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徬徨在十字街頭，莫知所從。結果因爲受不住貧困的壓迫，又不斷的向統治階級暗送秋波，假冒名士，希望得到一點殘羹冷食。有的更混跡權門，做着食客。這種人，比迂儒腐士還要可憐，因爲迂儒腐士，是被統治階級所牢籠，所麻木，已不知不覺的忘去了亡國的慘痛；而這些假名士，却要沽名釣譽，希望以他的名士身份，被統治階級所賞識，是有心去做奴才，搖尾乞憐，真正令人恶心。

書中的假名士，搖尾乞憐，令人恶心的，要算楊執中和權勿用。他們都是藉名士的虛名待價而沽。一旦遇到婁家兩位公子，怎能不受寵若驚，甘心去做權門的食客！十一回婁府的兩公子，同蘧公孫去訪楊執中的一段，把楊執中這班人真罵得體無完膚，作者不但寫來毫不用力，其沽名釣譽的虛偽情態，簡直透紙而出。

「三公子指着報帖，問道：『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楊執中

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會被禍的時候有此事。只爲當初無意中補得一個廩，鄉試過十六七次，並不能掛名榜末；垂老得這一個教官，又要去遞手本，行庭參，自覺得腰膀硬了，做不來這樣的事。當初力辭了與獄吏爲伍！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以大力垂手相援，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只好瘦死囹圄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報！』……兩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數日。楊執中說：『新年略有俗務，三四日後，自當敬造高齋，爲平原十日之飲。』

權勿用是楊執中的化身。作者嫌一個楊執中，諷刺得不痛快，添一個權勿用，來將楊執中身上遺漏的地方，借他補寫出來。作者諷刺楊執中還比較隱諱。可是對權勿用，就直接了當的痛罵起來：

「那少年道：『那個什麼潛齋？我們學裏不見這個人。』那鬍子道：『是他麼？可笑的緊！』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說與你聽。他在山裏住，祖代都是務農的人。到他父親手裏，掙起幾個錢來，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讀到十七八歲，那鄉裏先生沒良心，就作成他出來應考。落後他父親死了，他是個不中用的貨，又不會種田，又不會做生意，坐吃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縣考的覆試也不會取。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借在個土地廟裏訓了幾個蒙童，每年應考混着過，也罷了，不想他又倒運。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鎮上鹽店裏一個夥計，姓湯的老頭子來討帳。住在廟裏，獸頭獸腦，口裏說什麼天文地理，經綸匡濟的混話。他聽見就像個學生也不來了，在家窮的要不的，只在村上騙人過日子。』

智識階級的這種墮落行爲，在當時似乎已成風氣。影響所及，連測字的丁言志陳思阮和堂子班的烏龜王義安，也都冒充斯文。真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所夢想不到：明朝遺老們所倡導的不合作主義，居然因他們的高壓和牢籠，變成強弩之末，益發使他們積極施行牢籠政策，

124932

而不遺餘力。吳敬梓目擊當時的世風漸趨下流，痛心民族思想，已在統治階級的計劃下，被輕巧的從士林中塗抹盡淨。覺得這些市井無賴的溷跡儒林，假冒風雅，容易影響下層階級；怕牠會摧殘掉遺老們移植在下層社會中的民族思想。所以在諷刺他們的時候，是尖刻萬分，冷嘲冷諷，嬉笑怒罵的盡量挖苦。他在嘲笑丁言志和陳和尙（思阮）互爭名士，打滾到橋下以後，又以一大段的篇幅，來描繪這呆名士的愚拙。

「……回家帶了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戴一頂方巾，到來賓樓來。烏龜看見他像個呆子，問他來做什麼。丁言志道：『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烏龜道：『既然如此，且秤下箱錢。』

烏龜拿着黃桿戥子。丁言志在腰裏摸出一個包子來，散散碎碎，共有二兩四錢五分頭。烏龜道：『還差五錢五分』。丁言志道：『會了姑娘，再找你罷。』丁言志自己上得樓來，看見聘娘在那裏打棋譜，上前作了一個大揖。聘娘覺得好笑，請他坐下，問他來做什麼。丁言志道：『久仰姑娘最喜看詩，我有些拙作，特來請教。』聘娘道：『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不是白看的，先要拿出花錢來再看。』丁言志在腰裏摸了半天，摸出二十個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聘娘大笑道：『你這個錢只好送給儀徵學家菴的摸毛的，不要玷染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吃罷。』丁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二白，低着頭，捲了詩，揣在懷裏，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

迂儒腐士假名士，都是滿清帝國主義懷柔政策下的產物。他們的愚拙，不是我們的笑料，而是民族思想被蠶蝕的悲痛！讀完儒林外史，從作者的淚影下，我們可以想到當時漢人是在過着怎樣悲痛的生活，智識階級們是怎樣的被御用，被愚昧！

四

趙苕狂先生在「儒林外史考」那篇文章裏，極力推崇吳敬梓的卓識遠見。在二百年以前，已能對舊禮教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但不肯

承認吳敬梓是排斥舊禮教，諷刺既沉縮於「倫紀生色」，不惜逼自己的女兒去殉夫，又禁不住悲悼女兒死得悽慘，忍不住悽惶惶惶的假道學的人。他在「儒林外史對於舊禮教的懷疑」那一段，有以下的論斷：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禮教實是一件要不得的東西，稱之曰吃人的禮教，一點兒也不過分！同時，在這樣的一段文字之下，我們更可知道：吳敬梓對於禮教，是持着如何懷疑的一種態度了！」

「不過，他所生的時代，還遠在二百年前，思想方面究竟尚有所限。所以，他對於禮教也只是持着一種懷疑的態度吧了，併不敢大聲疾呼的，公然有所排斥！然而，僅是這一些些的懷疑態度，已非和他同時一輩的人所能及得的了！」

其實，吳敬梓不僅懷疑舊禮教，還痛斥其爲禍之烈！在儒林外史四十八回裏，我們於讀完王玉輝的女兒三姑娘殉夫的悽慘場面後，就發覺作者在極力諷刺王玉輝的人性的恢復。他在女兒餓死後，到底禁不住天良的激發，不願參加明倫堂的祭禮，及至在虎邱船上，看見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禁不住又想起他的女兒死得悽慘，熱淚直滾出來。這不是公然在排斥舊禮教，痛罵封建社會患着急慢性的癱瘓病與敗血症是什麼？作者雖然諷刺王玉輝的假道學，實際就是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大加針砭。假若我們把王三姑娘和沈瓊枝這兩個女性連起來看，就覺趙苕狂先生的論斷，大有研究的必要。因為作者塑造沈瓊枝這個典型，就因正面的諷刺，不足以使讀者洞悉其目的不在人物的諷刺，而在社會制度的批判。所以借她反對被富商騙取爲妾，捲逃到南京賴刺繡賣詩爲生，做一個強有力的反饋，使人容易明白：應該做一個時代叛逆的女性，來用自己的力量，去打倒那吃人的禮教，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作者不肯將三姑娘的殉夫，說明是他自己甘心爲「倫紀生色」，而是因爲娘婆兩家的貧困；自己又不事生產，再下去的日子，實在不好過，不如乾脆的死去，免得受罪。就是隱約間已將王玉輝當時贊成他女兒的死節，並不真的爲着「青史留名」，而是私下高興可以減却

負荷。歸根究底，還是經濟問題，本心並不衛道。不過拿禮教做掩飾，正如統治階級的褒揚節孝，只在穩固他的政權；約束士大夫階級的思想，使其不致反抗他的奴使。這，我們只要看下面的一段引文，就可知道。

「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醫生在那裏看，用着藥總不見效，一連過了幾天，女婿竟不在了，王玉輝痛哭了一場。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候着丈夫入過殮，出來拜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我一個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親養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父親是寒士，也養不活這些女兒！』王玉輝道：『你如今要怎樣？』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着丈夫一處去了！』公婆兩個聽見這句話，驚得淚如雨下，說道：『我兒！你氣瘋了！自古蠟蟻尚且貪生，你怎樣講出這樣話來？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不養活你，要你父親養活！快不要如此！』……王玉輝道：『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罷，自古心去意難留。』因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的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逕來到家裏，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怎的越過越駁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怎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息。老孺人勸女兒，那裏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不吃。母親和婆婆着實勸着，千方百計，總不肯吃，餓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親看着，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來，在家睡着。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床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駁子！三

女兒他而今已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門去了。』

吳敬梓爲什麼嘲笑這些假道學的人呢？實在是他不願意受統治階級的這個法寶（禮教）所約束；不但不願意，而且極同情那些給禮教壓迫得沒法活下去的人，和雖不願意，却沒勇氣或公然反對這種約束的人。所以他諷刺假道學的王玉輝，是可憐他太懦怯，不敢跳出統治階級約束他們的樊籠；被禮教壓迫得泯滅了人性，不敢勇敢的愛，痛快的笑，悲憤的仇恨。完全像是一具骷髏，在爲別人的喜怒哀樂而生，在爲不合理的社會的蠶蝕他們的生命而生。

關於這個問題，日人竹田復在「中國文藝思想」一書內，曾有下列的批評：

「儒林外史是對於科舉——即中國特有的官吏登用試驗制度——的嘲笑，與對禮教奴化下的人心的諷刺。如果換句話說，那麼溫暖的被解放的人間性的主張，正是康熙乾隆文化產生的好意義，是健康的果實。而這些作者的苦悶，都是從那對負載着數千年的傳統思想完全衰老了的中國民族性的反動產生出來的。」

吳敬梓諷刺王玉輝這些假道學，就是在極力主張恢復人間性。一個人再不能讓吃人的禮教，剝奪了生存的權利。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再不能讓他繼續存在。趙若狂先生，說他不敢公然反對舊禮教，那見解實在未免過於迂腐。

五

儒林外史裏所諷刺的對象，雖然都是些當時社會羣相中的渣滓；但作者實際所諷刺的，却是社會制度，與滿清帝國主義。作者假藉這些羣魔，恣意的攻擊當時的統治階級，盡量的批評社會制度不良。所以，雖在當時文網極嚴，不但作者未被株連，這部於滿清帝國主義極爲不利，有爆炸性的革命的檄文，居然被視爲儒林的佚史，笑料，被

124934 保留了下来。這是作者的描寫手腕高超，無怪魯迅先生一再譽其感而能譜，婉而多諷，筆多藏鋒了。

因為吳敬梓有感於士大夫階級的被牢籠，醉生夢死，失去了人性，雖過着牛馬似的生活，却甘心被滿清帝國主義所奴使，痛心於自己的周圍，全是昏昏懵懵的。曉得要使全民族擺脫滿清帝國主義的桎梏，非先喚醒這些被麻痺的人不可。書中所諷刺的迂儒腐士假名士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以及假道學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智識階級，也沒有一個不是作者熱望他有所振奮的。

作者借被諷刺的人物，代言人民的痛苦，控訴社會的罪惡，抗議滿清帝國主義的暴力統治。所以他雖然諷刺的是智識階級，但筆鋒所向，却網羅了不少其他階層的人物。這本書不但是當時政治氣氛的水銀柱，儒林羣相的白描，也是消沉的士氣中的一陣春雷，這雷聲到底喚醒野火未盡燒完的春草，在蕩漾的春風中，完成了若干年後的辛亥革命。

我們第一次在樓梯上遇到，但是我們變成朋友，是因為他有廚房，而我有浴室。那是在一九二〇年，維也納天氣很陰鬱，房屋管理局支配着房子。我們的房子在麥加里吞區。這條街稍下去一些，在蔓草叢生的花園裏有着灰色的和黃色的大廈，其中有幾座居住着各國軍事代表團的武官，外國大使館的職員，甚至是奧國的王公，但是大多數的大廈分配為官廳辦公處。在這條街我們的一端，房子却很平常——低層是小食品雜貨店或臘腸店，或掛着馬肉的屠宰店。石頭的樓

(註一) 儒林外史的成書，魯迅先生斷定在雍正末年(見中國小說史略)，大抵是根據閑齋老人的「乾隆元年二月」的那篇序文說的。其實這幾個年月並不可靠。胡適之先生把他作於乾隆二年至十五年(一七四〇—一七五〇)較為合理。因為「先生於乾隆元年三月在安慶應考博學鴻詞的省試，前一月似無作小序之暇。況且書中寫杜少卿莊紹光應試事，都是元年的事，決無元年二月成書之理。」(胡適：吳敬梓年譜)

(註二) 清代纂修四庫全書，大規模的搜求遺書，銷毀違礙的書籍，達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其收入四庫全書內的書籍，因觸犯忌諱，而任意刪改竄亂的更多。(余選：本國史)

(註三) 譚正贊在中國文學近史內，論及儒林外史的諷刺人物時，曾有如下的結論：「……作者專在攻擊矯飾的頹風，又痛心於一般世人醉心於制臺，而忘記了社會生活，所以書中都是此種人物。……他一方面發揮自己的理想社會，但見解仍帶酸氣，處處在維持他的正統的儒家的思想，所以不能與社會以重大影響。」
「……敬梓的文章很鋒利，描寫力很富裕，惟見解帶太多的酸氣，處處維持他的正統的儒家思想，頗使讀者有迂闊之感。」(鄭振鐸：文學大綱)

獻給頓尼一個花園

Dorothy Thompson 作
地譯

梯被磨損，沒有覆上地毯；鏤花模板的牆壁久已沒有粉飾；油漆有時是灰泥從上面剝落下來。在我們的房子裏，居住着木匠和其他的工匠，及開臘腸店的家庭。常常有一種霉腐和椰菜的氣味——大抵是守門者的椰菜，因為他和他的妻子住在黑暗的樓梯邊不透空氣的一個亭子間裏，總是打開了門煮飯。

我們在樓梯上相遇，因為我忘記了我的鑰匙。在我們的樓上，剛好有兩個房間。我常常看到他早晨出去，晚上回來，有時帶着一個像從糖果店裏買來的咖啡餅似的紙包。他並不悅人，我過去對他並不注意。他穿了潔淨但看來便宜的衣服，大抵買自瑪麗亞希爾夫街——